

【典藏版】

阅读无障碍本

# 坛经

李明 译注



岳麓書社

【典藏版】

阅读无障碍本

# 坛经

李明 译注

岳麓书社·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坛经/(唐)惠能著;李明译注. —长沙:岳麓书社,2016.11

ISBN 978-7-5538-0613-6

I. ①坛... II. ①惠... ②李...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  
②《坛经》—译文③《坛经》—注释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1060 号

TANJING

## 坛经

译 注:李 明

责任编辑:彭卫才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625

字数:185 千字

印数:1—10 000

ISBN 978-7-5538-0613-6

定价:18.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前 言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崇奉的经典，基督教顶礼《圣经》，伊斯兰教膜拜《古兰经》。但是，与这两大宗教的唯一经典信仰不同，同样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经典却是浩如烟海，卷帙浩繁，而称“大藏经”“群经”，有“三藏十二部”之多。古印度的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大部分。其中，“经”被认为是佛祖释迦牟尼所说，并为后代记录整理的所有经典，一般都以“如是我闻”开头，表明经典的内容是亲自听闻的佛的说法，也只有这部分经典被准以“经”来命名。随着佛法东传，中国人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撰写、研究千余年来也从未停止，各类佛教著作汗牛充栋，数量多得难以统计。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唯一被公开称为“经”的中国僧人撰述的经典，却只有一部《坛经》。《坛经》乃禅宗经典著作，是禅宗思想形成的标志，它影响了唐代以后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走向，对整个禅宗史、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都有重要影响。

### 一、《坛经》的版本与发展

中国禅宗的发展，一直以《坛经》为至圣宝典，从惠能<sup>①</sup>圆

---

<sup>①</sup> 惠能，亦作慧能。在中国古代，“惠”与“慧”两字通用，所以两者名之皆可。本书中通用“惠能”。

寂至今的千余年里，各种版本的《坛经》先后出现，对于《坛经》版本的研究也比较成熟。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版本，国内外共有相关校本近三十种，在对这些版本的比较研究中，学界所取得的基本共识是：《坛经》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惠能是《坛经》的原作者，后人陆续对其内容进行了润色和扩增。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版本：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个版本虽然在结构、内容、字数上有所区别，但其反映的禅宗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余版本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郭朋：《坛经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下面就对这四个版本进行简单的介绍。

### （一）敦煌本

192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整理该馆收藏的敦煌文献时，发现了《坛经》的一个唐代手抄本，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署名为“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共为一卷，五十七节，不分品目。由于此本是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窃走的，因此被称为“敦煌本”，又因为这个本子的作者署名法海，所以也被称为“法海本”。该本首尾完整，经过校刊后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坛经》手抄本，但并不能说这就是最古老的原本，也不能说是最早的流行本。同属于敦煌系统的《坛经》本子还有五种，分别是北京图书馆藏卷轴本残片一页（盛唐时代经生抄本）；北京图书馆藏卷轴本（只抄写了《坛经》的后部分，尾未抄完，但附有尾题）；敦煌博物馆藏册子本（简称“敦博本”，抄本首尾完整，字迹工整，错误较少）；原旅顺（今大连）博物馆藏册子本（简称“旅博本”，直到2009年12

月，方才“失而复得”<sup>①</sup>，2010年，首次向学术界公开“旅博本《坛经》”的全部内容，为现今发现最早的和唯一记有“年款”的敦煌本《坛经》；西夏文本（简称“西夏本”，仅存残片七页）。

在以上介绍的这六个版本中，除去刚刚“失而复得”而正在整理研究的“旅博本”外，只有“敦博本”和“敦煌本”是完整的抄本。比较而言，“敦博本”比“敦煌本”抄录得更工整、更清秀，讹讹较少，堪称敦煌本《坛经》的善本（见附录）。

## （二）惠昕本

“惠昕本”因惠昕改编而得名，刊印于宋朝，因此也称“宋本”。最初发现于日本京都掘川兴圣寺，故又称“兴圣寺本”。根据此本的两篇序——惠昕序和晁子健的后记，可知它是北宋初年邕州（今广西南宁）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所编定，共二卷十一门，14000字，编定时间为“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杨曾文先生曾考证：“惠昕本有不同的刊本，迄今发现有这样几种：（1）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的周希古刊本，在日本名古屋真福寺发现，称真福寺本（手抄本）；（2）宋政和六年（1116年）的存中再刊本，在日本石川县大乘寺和金山天宁寺都有发现，故也称大乘寺本和天宁寺本（手抄本）；（3）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的晁子健刊本，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称兴圣寺本（刊印本）。这些刊本内容基本相同，但在一些称呼、传法世系方面，有的刊本差异突出。”（杨曾文：《〈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

---

<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上调旅顺博物馆馆藏佛经，旅博本《坛经》意外未被拿走，学术界以为它已佚失。2003年，旅顺博物馆进行文物数字化管理，在对旅博本《坛经》进行了拍照后，和众多文献档案资料混在一起的旅博本《坛经》被作为“普通古籍文献”定为三级文物。

### （三）契嵩本

“契嵩本”是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宋代工部侍郎郎简出资，沙门契嵩根据“曹溪古本”（故又称“曹溪古本”）校刊而成的本子，全书分为三卷。然而这三卷本的“曹溪古本”，即“契嵩本”早已不见于世。元朝末年，僧人德异说自己发现了《坛经》古本，并于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吴中休休庵”刊印了这种本子，史称“德异本”。据学者研究，“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经文为一卷十门，字数已经增加到20000余字。现世能见到的“契嵩本”是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印的“高丽传本”。

### （四）宗宝本

“宗宝本”是元朝僧人宗宝的改编本，又称“流布本”，是明朝以来最为流行的版本。根据宗宝本中的跋文可知，僧人宗宝“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版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讎，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即他有感于三个版本各有得失，于是对诸本进行了改编，从而产生了宗宝本。至于宗宝跋中所提到的三种版本究竟是哪三种，是契嵩本、德异本和惠昕本，还是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学术界并无定论。

与最早的敦煌本相比，该本在内容结构、语言表达以及文字数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敦煌本的内容分为五十七小节，而宗宝本却将全经分为十品。敦煌本的语言质朴，行文言简意赅，没有过多的修饰；宗宝本的语言大多经过修饰，行文有较多铺垫；敦煌本只有12000字，而宗宝本已经达到24000余字，整整多出了一倍。然而，尽管两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其主题内容、基本思想仍然是一致的。凡是宗宝本中有的，敦煌本中也都有。《坛经》所要表达的明心见性、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等思想，在

敦煌本和宗宝本也都是一致的。

比较而言，宗宝本的文字更为通顺，对禅宗思想的表述也更为详尽和全面。经过历代不同版本的修改以后而形成的宗宝本，是一个中和各家的本子，它把绝大多数禅宗派别所能接受的禅学思想固定下来，因此，从思想性、流传的广泛性、影响力来看，宗宝本比敦煌本更能代表唐宋之后禅宗思想的发展。因此最能代表禅宗公认的思想，能够完整地反映禅学的面貌。尽管当前注释敦煌本的学术注疏越来越多，但是基于上述原因，加之本书作为广大读者了解禅宗文化进门阶梯的创作宗旨，本书依然选取更为普及的“宗宝本”作为底本进行注疏，而将其他《坛经》版本的情况在本前言中加以介绍，并附敦煌原本《坛经》于文后，供读者赏析体悟《坛经》在历史发展中的文本增益与思想发展。

## 二、《坛经》的结构与内容

宗宝本《坛经》共分为“十品”，内容层层深入，下面就根据这十品的顺序，对《坛经》的内容简述如下：

“行由第一”，记述了惠能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之邀，于大梵寺内为众生升座说法的过程。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惠能幼年丧父，“于世卖柴”，忽闻经语，“心即开悟”，遂前往黄梅，“参礼五祖”的得法因缘，以及获得五祖弘忍所传衣法，成为禅宗六祖的过程。本品是整篇《坛经》的主题，此后九品，则皆是围绕于此的分论。

“般若第二”，记述了惠能大师应韦璩刺史之请，为信众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过程。这是一种能够度化众生，到达涅槃彼岸的大智慧。惠能在此讲述了自性般若智慧的意义和修行方法，其中涉及诸多禅学理论问题。

“疑问第三”，有疑而问，应问而答，应答而解。“疑问品”



记述了惠能大师在法会上为弟子解开心中疑惑的过程。在本品中，韦刺史代表所有弟子向惠能大师提出了三大疑问：第一，何为功德？第二，持念“阿弥陀佛”可否往生西方？第三，在家弟子如何修行？惠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挥了禅学的创新思维。

“定慧第四”，记述了惠能大师从不同的角度对众人开示定与慧的关系，一行三昧的真义，以及南宗顿教法门的宗、体、本。关于定与慧的关系，惠能大师开示道：“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所谓“一行三昧”，关键是要在一切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行、走、坐、卧，都恒常保持一颗真实清净的直心。南宗顿教法门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坐禅第五”，在本品中，惠能大师对那些执著于固守本心、观想净相的枯木坐禅的方法给予了批评，直言单纯的枯坐或者守定是成就不了佛道的。这其实也是对当时神秀一系的禅修理论和传统佛教的禅学理论的批判。进而详细阐发了他对坐、禅、定的理解，对传统的坐禅、禅定做了重新的界说。

“忏悔第六”，在本品中，惠能大师向大家讲述了“自性五分法身香”“无相忏悔”“四弘誓愿”“无相三皈依戒”“一体三身自性佛”的法门。“忏”为发露悔过过去所作的旧恶，“悔”为知错以后发誓不再作，合之才为“忏悔”。只知道忏其前愆，而不知悔其后过，不是真忏悔。惠能大师在此还特别强调了与传统佛教所讲的“忏悔”不同的“无相忏悔”。

“机缘第七”，记载了惠能大师应广大信众的需要，把握时机，应机说法，随缘开导。尽管人的根器有利钝之别，但是真如本心，般若本性却是毫无差别的。在惠能大师与信众相聚之时，有问有答，有疑有破，随机遇缘，禅机就在这一问一答间显现了出来。

“顿渐第八”，记述了五祖弘忍以后，禅宗分化为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虽然南宗惠能大师与北宗神秀大师之间并无宗派之别，但是两派门下的弟子却时常相互非难、争议，其中既有潜入曹溪法会学法的志诚，也有奉命谋害六祖惠能大师的志彻，还有前来故意非难惠能大师的神会。本品中，惠能大师就针对志诚、志彻、神会三人，进行了应机说法，向他们开示了南宗顿教法门，三人听法后，均皈依曹溪，成为惠能大师门下的著名嗣法弟子。

“宣诏第九”，本品记述了武则天、中宗下诏，派遣内侍薛简前往曹溪请惠能大师进宫供养，惠能大师托辞年老有病，不肯进京，并开示薛简的经过。

“付嘱第十”，这是《坛经》的最后一品，记载了惠能大师圆寂之前最后付法嘱托诸位弟子的过程，是惠能大师的最后说法也是临终遗言，将大师一生中所说之法进行了总结，并记录了惠能圆寂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 三、《坛经》的基本思想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占据了特殊重要的地位，唐宋以后更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作为禅宗的宗门经典，《坛经》涵盖了中国禅宗的独特智慧，其根本思想只需四个字即可表明——“见性成佛”。这一理论简单明了，易懂易记，雅俗共赏。

整个《坛经》的立论基础就是“性本清净”，即人人皆具自性清净心，佛性本有，因此人人皆可成佛。而众生尚未成佛的原因，就在于被妄念迷住了本心，使佛性不能显现。据此，性本清净，性自明觉，“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觉悟不在于向外追求，而在于反求诸己，识得自性，还

得本心，便能觉悟。《坛经》中关于“性本清净”的论述比比皆是，如：“佛性即无南北……佛性有何差别”，“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人性本净……自性本净”，“本元自性清净”，“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如上等等，都是为了告诉众生自性本来清净，只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反求诸己，就能够“顿现真如本性”。

这种“即心即佛”的佛性论使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佛教主张的外在的止观坐禅等修行方式、依靠他力求生西方，以及那些繁琐的佛教义理和名相分析，在《坛经》中都被重新解读，取而代之一种崭新的以“人”为核心的“心”学思想。原本佛教是否定主体存在的，但是到了惠能这里，心性本体的观念却被确立起来。惠能在谈到自己的无修之修时，提出了“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三原则。无念，“于念而不念”；无相，“于相而离相”；无住，念念相续。同时《坛经》还提出了“三十六对法”，如天地、日月、明暗、阴阳、有无、色空等，“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通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超越了这二元对立，方能“见性成佛”。这从本质上讲，禅宗思想就是强调一种“离念、离相，超二元对立的否定性思维”，是一种涵盖一切的超越精神。（参见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坛经》的心性本体论还表现在“自心三皈依”和“唯心净土”的提出。佛教本有“佛、法、僧”三皈依之说，但是惠能却提出“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用“觉、正、净”三个无相的心性学范畴取代了“佛、法、僧”三个有相的存在。因此，在惠能这里，真正皈依的其实是那颗本自觉悟、清净、纯正的心，心性本体论再次被强调。

值得一提的是，南宗惠能的禅宗思想之所以大为流传，还与

《坛经》中所谓“顿悟成佛”、直截了当的修行方式有密切关系。惠能的“顿现真如本性”是在一刹那完成的，不需要有渐进的过程，“不假外修”，“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因此，他并不以为静坐敛心才算是禅，他教人只从无念著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应该任心自运，无所执著，这才是禅的真正意境。其实，关于禅与禅定，在《坛经》之前，两者始终是混为一谈的，直到《坛经》中云：“外于一切境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这才第一次将禅宗思想从禅定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外而离相，内而见性，才是禅。也就是要借离相的否定性思维，达到见性的目的，以自我意识否定客观世界的种种对立，达到与本体的合一。在这里，定、坐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已。因此，他对“坐禅”“禅定”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主张禅于一切行、住、坐、卧之中，而绝不是如哑羊枯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顿悟之说，也不过是禅宗否定性思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而已。

总之，《坛经》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它使佛教思想的重心“由外在的佛性转为内在的人心，由关注佛土来世转为关注人间现世，从而使中国佛教具有浓厚的以人为本，以心为宗的理论色彩”。（潘蒙孩：《〈坛经〉禅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

#### 四、《坛经》的注疏与研究

《坛经》作为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自问世以来，就很快风行禅林，影响深远。千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佛教界，对《坛经》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坛经》的注疏，历来很多，如契嵩的《法宝坛经赞》、天柱的《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宝坛经节录》、李贽的《六祖法宝坛经解》、恒璇的《法宝坛经要解》等（参见尚荣注译：《坛经》，

北京：中华书局，2010），皆收录于《大藏经》。进入到20世纪以来，特别是敦煌遗本《坛经》的发现，更引发了《坛经》的研究高潮，有关《坛经》的校注、译注成果非常可观。据有学者统计，国际上关于《坛经》的各种校注本将近三十种。中国大陆的校注本，现代翻译本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流行和重要的有：郭朋点校、注释的《坛经对勘》（山东：齐鲁书社，1981年）、《坛经教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坛经导读》（四川：巴蜀书社，1987年）；杨曾文点校、注释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魏道儒译注的《白话坛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徐文明注译的《六祖坛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黄连忠编撰的《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6年）；尚荣译注的《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等等。

有关《坛经》的研究成果众多，其观点必然见仁见智。除前面所讲的版本问题，与之相关还有三大问题特别引人关注。

其一，是关于《坛经》的作者究竟何人。20世纪中期，还为此引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先是胡适据敦煌文献新发现的资料，先后发表《菏泽大师神会传》等数篇文章，提出《坛经》的作者不是惠能，而是神会。之后，钱穆、杨鸿飞、蔡念生、澹思等人不断加入论争。印顺法师也于1971年撰文《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有力的考证，认定《坛经》的作者就是惠能，神会门下只是补充了一部分。自此以后，学术界也大多赞同“《坛经》基本反映了惠能思想，同时其内容也有后人增益之成分”的观点。（参见李天保：《永恒的禅宗学术经典——〈六祖坛经〉评介》，《求索》2010年第12期）

其二，是关于《坛经》的“嗣法三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千百年来，惠能的这首

偈语在佛教界、思想界、缙绅、士民之间广为流传，成为代表禅宗顿悟特征的口号。与神秀的那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相对应，二人优劣高下立判。然而随着敦煌本《坛经》的发现，其中有关惠能的“嗣法偈”，从一首变为了两首，分别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这两首偈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也与原来人们所耳熟能详的那首偈子大相径庭。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外学者围绕“嗣法三偈”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陈寅恪写有《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说“敦煌本《坛经》偈文较通行本即后来所修改者语句拙质，意义重复，尚略存原始形式。”并提出了两个批评：第一，此偈之譬喻不适当；第二，此偈之意义未完备。陈寅恪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应。田光烈、刘楚华纷纷撰文回应，并认为，“菩提树”是“佛法身”的象征，此处譬喻并无不妥。而关于这“嗣法三偈”的真伪，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敦煌本”的第一首是真的，第二首是衍文，流通本的偈语是经过后人被篡改的，郭朋先生即持此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次偈并非衍文。“敦煌本”《坛经》中两首偈子均与《金刚经》的“无住”“无相”思想相契合，是惠能所开创的南禅思想的核心所在，前者破，后者立，相辅相成，李润生的《神秀、慧能偈颂辩解》支持这一论点。第三种观点认为，流通本的偈语才是惠能真正的“嗣法偈”。净慧法师专门撰写《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兼论〈坛经〉的版本问题》和《关于慧能得法偈再探》二文，进行论述。（参见李志军：《“慧能三偈”是非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其三，还是围绕“嗣法偈语”，是就神秀和惠能的偈语究竟孰高孰低而展开的讨论。无论惠能的三首偈语孰真孰假，有一点

似乎已成定论，那就是，“惠能偈”优于“神秀偈”，五祖衣法最终是传给了惠能。因此，历史上不乏对惠能偈语的褒扬，乃至神话。然而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逐渐有学者提出诸如“神秀偈”优于“惠能偈”（大圆：《论能秀两大师》），“神秀偈”是伪造的（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新论。即使抛却真假是非不论，从《坛经》所表达的意思来说，“惠能偈”与“神秀偈”一样，同样未曾“明心见性”。倘若说“神秀偈”执著于“有”，“惠能偈”无疑执著于“空”了。“迷时师度，悟时自度”，惠能作偈后，五祖弘忍还要为其讲《金刚经》，也足以证明此境地里的惠能未圆、未彻、未真正见性。直至讲到“应无所住生其心”时，惠能才真正圆了、彻了、见性了。（参见陈燕：《从〈六祖坛经〉看不立文字》，《名作欣赏》2009年第7期）

总之，《坛经》是禅宗思想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和反映，是中国化佛教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里程碑，确实值得每一个人学习、传承，并体悟其中的含义，得般若妙智，超一切烦恼，获自在解脱。

在本书的注释过程中，参考了诸位方家的研究，实在算不得愚人的成果。由于本书针对的主要是对佛学感兴趣而又认识尚浅的读者朋友，因此注释之时较之前人注解，会尽量全面、详细一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坛经》的内容绝不止于佛学一门，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本书对其中包含的基本佛学词汇、国学常识、文化术语，甚至是生僻不为大家所熟识的字、词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并希望这不仅只是一本《坛经》的注释书籍，更能成为大家熟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的“敲门砖”，也算是本书不同于他书的一点可取之处吧。

## 目 录

前言	( 1 )
行由第一	( 1 )
般若第二	( 40 )
疑问第三	( 68 )
定慧第四	( 83 )
坐禅第五	( 93 )
忏悔第六	( 97 )
机缘第七	( 114 )
顿渐第八	( 153 )
宣诏第九	( 170 )
付嘱第十	( 177 )
附录：	
《敦博本六祖坛经》	( 202 )
参考文献	( 226 )



## ❖ 行由第一 ❖

### 导读

行由，修行之因缘由来也。“行由品”记述了惠能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之邀，于大梵寺内为众生升座说法的过程，本品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惠能幼年丧父，“于世卖柴”，忽闻经语，“心即开悟”，遂前往黄梅，“参礼五祖”的得法因缘。其初见五祖时所言之“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的答语，开门见山地表明了禅宗“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故“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理论。而那首脍炙人口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得法偈子，在强调“佛性本清净”的基础上，更暗含了“顿悟成佛”、直截了当的修行方式。得法之后，惠能“迷时师度，悟了自度”之言，则表明了禅宗不假外借，反求诸己的思想。回到岭南后，惠能与樵夫、猎户为伍隐居了十六年。其后到广州法兴寺，由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指向了中国佛教所特有的心性本体，震惊四座，备受瞩目。从此开坛说法，南宗兴起，一花五叶，至今绵延不绝，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由于以上诸多禅宗著名的典故均来源于此，禅宗思想的特质也在本品中被一一昭示，因此可以说，“行由品”是整篇《坛经》的主题，此后九品，则皆是围绕于此的分论。